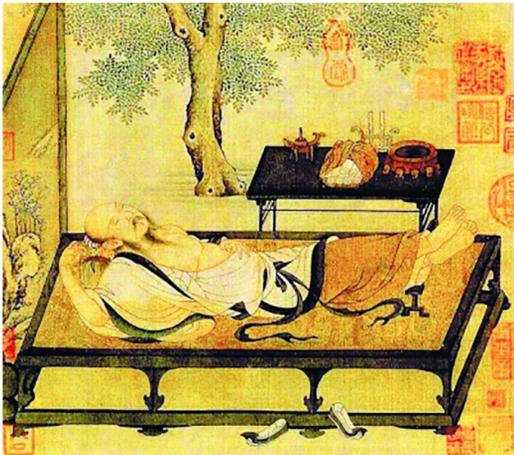


古诗古画说“消暑”



《槐荫消暑图》故宫博物院藏

钩沉

夏天烈日炎炎,如果能有一片遮天蔽日的树荫,那便是乘凉的好去处。事实上,在古代,这是大多数人的消暑方式。比如,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、文学家魏收,夏天坐在板凳上,躲在树荫下读书,随着日光的移动,树荫自然也随之移动,魏收也就跟着树荫移动读书,由于精力集中,竟忘记了渴暑。

古代的文人墨客,还喜欢将这份盎然情趣入诗入画。如今,通过欣赏这些“消暑”的古诗古画,也能隔着千百年的时光感受到昔日的那份闲情逸致。
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宋代画家(佚名)所作的《槐荫消暑图》,它描绘了一位文人在树荫下怡然自得的消暑情景。庭院中有一株槐树,枝叶繁茂,浓荫下,一人袒胸露背,仰卧在凉榻上闭目养神,高高翘起的赤足更显得超然洒脱、悠闲惬意。床头立着一面屏风,上面绘有雪景寒林图,与乘凉的氛围很融洽,让人顿有凉爽之感。在旁边的几案上,放着书卷、茶具等物件。可见在品茗清茶、阅览书卷之

后,一阵凉风袭来,这位文人顿觉困意,躺在凉榻上打盹。这幅作品人物刻画细致,设色古雅,行笔飘逸柔美,气韵清新优雅,流露出一种沉静、安逸的韵味。

观此图,很容易想到唐代诗人白居易《池上逐凉》一诗:“青苔地上消残暑,绿树阴前逐晚凉。轻履单衫薄纱帽,浅池平岸席藤床。”唐代诗人陆希声的《阳羨杂咏十九首·绿云亭》也有此意境:“六月清凉绿树阴,小亭高卧昼凉侵。羲皇向上何人到,永日时时弄素琴。”

北宋诗人秦观同样钟情于夏天树木的浓密葱绿,它能使人凉爽可心,他有诗曰:“芳菲歇去何须恨,夏木阴阴正可人。”

除了阴阴夏木,竹林也是避暑的好去处。明朝画家仇英的《竹梧消暑图》体现了另一种盛夏纳凉的情趣。画面远处青山叠翠,起伏连绵;近处翠竹疏朗,山溪青青,潺潺而流。

竹林之中,有二人相对而坐,但见他们长髯拂胸,身穿宽袖长袍,仙风道骨,正侃侃而谈。飘逸的人物和幽静的环境融为一体,早已忘记了炎热,犹如置身于清凉仙境。山溪之畔,一株梧桐树挺拔参天,郁郁葱葱,树荫下,一座凉亭屹立于溪水之上,亭阁三面通透,一面为山水画照壁。亭中几案上摆放着书卷,一人坐于凳上,手持羽扇,轻摇纳凉,若有所思,好像在构思诗作文赋。整幅画面色彩鲜艳,结构严谨,融山水、亭阁、林木于一体。在炎炎夏日,隔着画布,人们似乎也听见松涛阵阵,还有涓涓流水的轻快之声。

如果说要给这幅画上题诗,那一定是唐代诗人王维的《竹里馆》: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。”王维当时在蓝田建有辋川别墅,那里

林木茂密,山涧淙淙,馆舍、房屋散布其间,每到夏季,山风习习,凉爽怡人,王维和文人们在此度夏避暑,垂钓饮酒,谈论诗文,过着悠闲自在的隐居生活。

宋朝诗人杨万里,则喜欢在皎洁的月光之下,伴着清辉孤影,来到摇曳的竹林中,听夏夜里悦耳的虫鸣,此时夜深气清,诗意也涌上心头,他写下了一首《夏夜追凉》诗:“夜热依然午热同,开门小立月明中。竹深树密虫鸣处,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

河岸、池塘边也是古人乘凉的好去处。宋代宫廷画家苏汉臣的《荷塘消暑图》就描绘了在荷塘边纳凉的美女。画中的荷塘碧水涟漪,荷叶田田;岸边垂柳依依,枝条拂弄水面,景色宜人。两位仕女衣着素雅,凭栏观荷,一阵轻风拂过水面,顿时变得十分凉爽,并且伴着荷香,令人心旷神怡。

北宋诗人秦观除了在树荫下,也在河岸边找到一个绝离烦热的避暑方式:在荷塘边,安一张胡床。他斜躺在床上,尽情领略纳凉的悠闲自在。听着船上的笛声在水面萦绕起伏,闻着盛开的莲花在风中飘着幽香,他不由地写下了《纳凉》一诗:“携杖来追柳外凉,画桥南畔倚胡床。月

明船笛参差起,风定池莲自在香。”

当然,阴凉也好,河边也好,都是消暑的物质层面。对于文人墨客来说,消暑还需上升到精神层面,那就是古人常说“心静自然凉”。“心静自然凉”后来逐渐演化成一种人生境界。白居易有《苦热题恒寂禅师禅室》诗曰:“人人避暑走如狂,独有禅师不出房。可是禅房无热到,但能心静即身凉。”他在另一首《消暑》诗中,幽默调侃地说:“何以消烦暑,端居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保,难更与人同。”意思是只要你在院子里坐着,心无杂念,静下心来,你就会感觉窗子有凉爽的清风徐徐吹来,凉爽无比。

北宋诗人梅尧臣对心静自然凉又有另一番感受。他在《中伏日陪二通判妙觉寺避暑》一诗中写道:“紺宇迎凉日,方床御绉衣。清谈停玉麈,雅曲弄金徽。高树秋声早,长廊暑气微。不须河朔饮,煮茗自忘归。”意思是说,尽管是热浪翻滚的中伏时节,在清幽寂静的佛寺,因为没有俗世间杂念的羁绊,凉爽气息迎面而来,不必到北方酣饮避暑,在寺庙里品上一杯清茗就能乐而忘返。

□郑学富



仇英《竹梧消暑图》



苏汉臣《荷塘消暑图》

错得可笑的人名

广东、陕西、广西三家教育出版社所出的《文白对照十三经》中,自然有《孟子》,其中以白话文译出的一个人名,就错得很可笑。《告子下》中有句云:“舜发于畎亩之中,傅说(音悦)举于版筑之间。”是说舜从田野中被起用,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举拔任用。谁知“傅说”在译文中竟错成了“传说”。这当然是因“傅”与“传”的繁体“傅”形近致误。傅说在傅险(地名)为人筑墙,被殷帝武丁访得,与之语,果圣人,举以为相。(《史记·殷本纪》)译文将其错作了“传说”,谁还会将“说”读 yuè(悦)音,贤相硬被轻薄成笑话。搞成此笑话的还有岳麓社所出杨伯峻译的《白话

四书》:“舜从田野之中兴发起来,传说是从筑墙的工作中被举拔出来。”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赵昌平著《孟子·匡世的真言》:“商朝贤相传说是土木匠出身。”

“传说”来“传说”去,“传说”错了,当为“傅说(音悦)”。

还有错得可笑的“王玉玉(sù,音诉)”。《史记》中,原有《今上(汉武帝)本纪》这有《太史公自序》之言可证:“汉兴五世,隆在建元,外攘夷狄,内修法度、封禅、改正朔,易服色。作《今上本纪第十二》。”到东汉该已佚,“有录无书”,后以《封禅书》补之,易名作《孝武本纪》。《孝武本纪》中,言及武帝封泰山,见东北

山脚有古时建有明堂的地方,处地峻险又不宽敞,就想在奉高(地名)的旁边另行建造,却不明明白明堂的形制规模,“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。”公玉(sù,音诉),复姓,带,名。就是说,此人复姓公玉而名带。

此人名为《孝武本纪》中凡两见,《封禅书》亦同。然而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中,却将“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”中的“公玉带”错作了“公玉玉”。万卷出版公司出版的《史记全本》,将《孝武本纪》中两处“公玉带”错作了“公玉玉”。岳麓社所出杨燕起陈焕良等译的《白话史记》,将凡四见的“公玉带”全部作了“公玉玉”。

还有错得可笑的今人之名。现代著名史学家吴晗,是京剧《海瑞罢官》的作者,曾任北京市副市长,“文革”一开始便被打成“三家村”(另外两人是邓拓和廖沫沙)。某报谈及吴晗,竟将“吴晗”错作了“吴哈”;第二天更正,又错成“吴哈”,第三天再更正,又成了“无哈”,连姓也改了。一而再,再而三,教人哭笑不得。

“傅说”成“传(傅)说”,已是不沾调;“公玉”又作“公玉”与“公玉”,出闹更是“妙”;“吴晗”名姓三连改,凭空再捏造。姓名成笑话,热闹不热闹? □杨乾坤

语林指瑕

伯乐。闵政、李西兴这些象棋新秀,就是他在街道上的棋摊子上发现并挖掘出来的,并竭力扶持荐举,邀请安排登台与名手表演赛,锻炼进步,使他们有机会进入高手行列,成为市级棋手。后来闵政在全国赛上战胜名将,李西平获得陕西省象棋冠军,并有两次战胜国手刘忆慈的记录。很多参加全国赛的棋手无不受刘道平的关怀与指导。尤其是马长安,日后为陕西培养出三位象棋大师,与刘道平当年力荐到省体校任专职教练是分不开的。” □朱文杰



张丰(右)与刘道平先生(左)

棋迷。这是刘道平先生发起并团结了马长安、杨成海、阎守义,在青年会举办的名手表演。每场人数或四五百,或五六百,共逾二百场,人数超过十万人。这是西安市象棋史上持续最久,影响最大的活动。刘道平主持表演,作讲评,深入浅出,培养了一代象棋爱好者。”

在张丰先生的介绍下,我知道了1965年在革命公园举办的五省市象棋赛上,刘道平接二连三和安徽省象棋冠军袁昌幸、江苏省象棋冠军戴紫光后封刀。此后,他重点开始研究中国象棋史和裁判工作。尤其是在棋史研究上,在西北大学上学时打下的文史基础,让他在对棋史的研究上如鱼得水。1960年前后,他就在国家权威刊物《象棋》上发表多篇论文。创作了《<自出洞来无对手>著作时代考》,考证这部棋谱年代为明代前写成,还写了《现制中国象棋棋盘考》,考证出了北宋时的象棋盘,完善补充了我国古棋谱演变史。刘先生还在1960年《象棋》11期发表《对刘克庄“象弈”诗的研究》。1961年他写的《应该重视象棋史的研究》,张丰先生评价:“这是一部向中国象棋史进军的宣言书,从纵横各个方面论述研究象棋的重要性及必要性。”被《象棋》4期冠于卷首。1986年国家体委主持编写中国象棋史时,由他执笔起草《中国象棋史》编

写提纲,后又成为《中国象棋史》编写小组召集人。刘道平独自负责古代史的编写,期间刘先生的《历代书目考已佚古谱》等文稿面世。特别是1995年著述丰硕,相继有《宝应象棋新释》《北周武帝与象棋》《中国八八象棋商榷》《古代象棋史的分期》等7篇有份量的象棋史论文发表。可以说在研究中国象棋史上,刘道平先生当为扛鼎之人。

1981年陕西省棋类运动协会成立,他任首届副主席兼省棋协中国象棋领导小组组长。棋类运动包括中国象棋、国际象棋、围棋。从此省、市中国象棋活动就在刘道平的主持下开展活动。早在70年代刘道平就担任陕西省象棋队裁判,1990年他成为亚洲象棋联合会裁判委员会委员,1991年他由国家级裁判晋升为国际裁判,成为西北五省第一位中国象棋国际裁判。

教师出身的刘道平,学识渊博,为人忠厚,慧眼识人,爱惜人才,是发现和培养人才难得的大师。张丰先生撰写的《记著名象棋活动家刘道平》中还写道:“刘道平先生是陕西象棋

往事

“文革”期间,稿费被取消。1978年国家开始拨乱反正,稿酬制度得到恢复。

这一制度恢复不久,原《西安晚报》编辑徐剑铭就收到出版社的一张通知单,让他到财务科去领稿费35元,那是他发表一个相声的酬劳。拿到通知单后,徐剑铭马上去找陈忠实,陈忠实当时正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、革委会副主任。

徐剑铭去的那一天,陈忠实领着那一群农民在河滩上战天斗地学大寨。见徐剑铭来了,忙招呼到家喝水。当时,陈忠实的生活非常拮据,家里连茶叶也没有。到家后,他俩在炕上坐了。陈忠实夫人便数落起两个大男人:“整天舞墨弄文顶个屁用,给人家连把椅子都没有,连点茶都没有。”这句话提醒了徐剑铭,他立马掏出那张通知单说:“瘦子呀,从前是白写,往后有稿费了!”陈忠实夫人接过那张出版社的通知单,看了好几遍,拍了两巴掌说:“俺忠实啥时候能拿到这单子就好了!”陈忠实当时眼前一亮:“这条挣钱的门路实在太光辉灿烂了。”

陈忠实那时候已发表过不少东西,稿费却一分钱也没有过,只是收到过几次卡片,拿着卡片可以到指定书店去领几本书。话又说回来,“文革”时,书店除了政治色彩浓的书以外别无他选。

当时,不仅陈忠实没见到过稿费,贾平凹也是这样。据作家张敏回忆,1978年初他在《解放军文艺》发表散文《奉献母亲》,得到稿费12元,这笔稿费当时能在粮店买两袋面粉100斤,一家四口一个月基本就够了。张敏据说是陕西“文革”后第一个收到稿费的人。

上午收到稿费,下午张敏便去找贾平凹。这位后来名声显赫的大作家,当时竟然也没有见过稿费单子。他拿起稿费单子,一次又一次问:“怎么会是稿费单子?”张敏得意地说:“这确实是一份稿费单,你看上面有《解放军文艺》杂志社的大印。” □姜炳炎

寻找田小娥

电影《白鹿原》上映后,有人说把《白鹿原》拍成了“小娥传”,不少人为这部作品“叫冤”,但作者陈忠实却说满意。田小娥这个形象不论是在小说《白鹿原》中,还是在话剧、电视剧、舞剧等《白鹿原》中,都是一个关键的角色,甚至可以说没有田小娥这个形象,就没有《白鹿原》这部小说。

小说的人物形象一般都有原型。《白鹿原》中田小娥的原型是谁,陈忠实是怎样发现这一原型的呢?

1985年秋冬之交,陈忠实在创作中篇小说《蓝袍先生》时,引发出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的创作念头。但就在1985年8月下旬召开的陕西长篇小说促进会上,陈忠实作了一个很短却很明确的表态发言,时表示尚无长篇小说写作的丝毫准备,什么时候发生长篇小说写作的念头,没有任何考虑。可见,写作的灵感往往是在写作中萌发。

为了给《白鹿原》的创作准备素材,经过认真考虑,陈忠实决定查阅蓝田县、长安县和咸宁县的县志。1986年,陈忠实在查阅蓝田县县志时发现,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,竟然有四五十个卷本记录了贞妇烈女的事迹等。贞妇烈女卷的第一卷第一位记录着某某村、某某氏,但没有妇女的名字,前头是她丈夫的姓,接着是她的姓,两个姓氏合在一起就是一个贞妇烈女的称谓:某某氏,十六岁结婚,十七岁生子,十八岁丧夫,然后就是抚养孩子,伺候公婆,完成一生。但住后记载的贞妇烈女,一个比一个文字少,到了最后,仅仅剩下某某村、某某氏,守节守志的文字没有了。面对这些没有任何细节的记载,陈忠实干脆推开了志本不看了,这似乎很难帮助他构思和创作长篇小说。但就在他推开志本的一刹那,心里颤抖了一下,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,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,还没有留下真实的姓名,也不会有人过多关注这些记载,面对这种悲哀,陈忠实又拿起县志,一页一页地翻过去,在密密麻麻的姓氏浏览过程中,他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背脊乃至恶毒的意念,在无以数计的贞妇烈女简要记载中,应该有这种声音,反顾那种腐朽不堪的婚姻制度。田小娥的形象由此产生了。

在田小娥这一形象的塑造过程中,陈忠实还融入了自己在民间听到的不少有关妇女的故事和笑话,使这一形象更加典型而鲜活。

田小娥渴求的是一种寻常百姓最平淡的柴米油盐的生活,但不论是在她的出生地田家湾,还是在郭举人家和白鹿村,这个不算高的祈求都没有实现。田小娥的一生是痛苦的,她的痛苦至今观照着我们对于生命的理解。正如法国作家埃莱娜·西苏所说:“通过生存于黑暗,往返于黑暗,把黑暗付诸文字,我眼前的黑暗似乎澄明起来,或者简单地说,它逐渐变得可以接受了。”

《白鹿原》是陈忠实的代表作,自称是垫棺作枕的著作。《白鹿原》中塑造了许多典型而丰满的形象,多情的白嘉轩,贪食与狭气的鹿子霖,沉静而豪狠的黑娃,但田小娥这个白鹿原上的幽灵形象,给许多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。 □付海贤

陈忠实第一次知道有稿费